

近年国际“贝学”研究与译介发展态势

——与洛伊丝·欧维贝克的对话

曹波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本文是曹波教授访学美国埃默里大学期间与该校研究生院教授、著名贝克特研究专家洛伊丝·欧维贝克的学术对话。两人首先论及当下贝学(萨缪尔·贝克特研究)的趋势,尤其是欧美的三种态势:从不同视角对贝克特出版作品的研究推陈出新;对贝克特戏剧艺术(导演、革新及域外变异)的整理研究持续不断;手稿、笔记、档案等原典的整理成果趋向电子化。对于新世纪工具书,两人从领域互补的角度评介了四种:《盛名之累》《格罗夫指南》《诗集》和《书信集》。谈及贝克特全球译介的新动向时,曹波评述了汉译的历程,重点论及“副文本”的学术史价值和“间接介入”对“学术型”文本翻译的意义。这场对话对中国贝学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也向西方学界展现了汉译的成就。

关键词: 萨缪尔·贝克特;研究态势;工具书;汉译;副文本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1)04-0114-08

曹波(以下简称“曹”): 作为埃默里大学爱尔兰研究中心的前辈,您一定知道在20世纪爱尔兰文学史上,“有三位作家彻底改变了文学的面貌”。

欧维贝克(以下简称“欧”): 那当然,是威廉·叶芝(William B. Yeats)、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他们都是西方现代文学的偶像,相关研究和节庆已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业,是爱尔兰向外推广其“文学大国”形象的重要抓手。

曹: 其中,贝克特走的是“去爱尔兰”的极简主义道路。他的驳杂、深邃在欧美现代派文学史上少有匹敌,相关研究和演出活动可能赶超“让学者忙上300年的乔学产业”,这大概就是您所说的“贝克特是一所(念不完的)大学”的意思吧。

欧: 是的。在西方,贝克特研究早已成为显学:国际萨缪尔·贝克特学会已有欧美会员3600多人,雷丁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爱丁堡大学和安特卫普大学的顶级专家依次主编了《贝克特研究杂志》,雷丁大学设立了贝克特国际基金会,埃默里大学和巴黎美利坚大学合作成立了贝克特书信研究中心,等等。相信在日益自信的中国,贝学也取得了长足发展。

曹: 没错。自20世纪末孟京辉排演《等待戈多》、陆建德发表雄文《自由虚空的心灵》、李维屏就《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等戏剧开展教学以来,相关研究者、翻译者、教学者、戏剧实验者及一般爱好者的队伍也迅速壮大,掀起了学术的热潮。

欧: 你们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了吗?

曹: 还没有,但这并不表明中国的贝学就乏善可陈。传入文化与域外文化发生碰撞时,会产生扭曲和新的特征,因此中国的贝学不是欧美贝学的复制或缩小,而是延展和变异。二者具有纵向比较的价值,却不是

收稿日期:2021-04-10

作者简介:曹波,男,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和爱尔兰文学研究。

恰当的横向对比项。

欧:这很自然。我是出于好奇。

曹:而我好奇的是,21世纪以来欧美贝学呈现了怎样的态势呢?

欧:这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个人认为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哲学、文艺学、精神分析学、解构主义等视角对纸质作品展开的专题研究依然兴盛,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掘,这类研究还可带来许多新意,因此这一方面事实上非常复杂;二是1976年创办的《贝克特研究杂志》所刊文章兴许就是重要的风向标;最后,欧美国家的学术出版社每年都有许多这类专论出版。

曹:那您能就最新专论说得具体些吗?

欧:按论题分类吧。有一组“后人类”专论令人瞩目,比如在《贝克特的晚期戏剧:创伤、语言与主体性》(2018)中,特兰特尔(Rhys Tranter)阐释了贝克特在晚期戏剧中描绘的后人类图景;在《贝克特短篇散文中的后人类空间》(2019)中,博尔特(Jonathan Boulter)则挖掘了贝克特碎片式文本中的精神困境;而在《贝克特与主体性的语言》(2018)中,图布里迪(Derval Tubridy)更“为从后人类视角对贝克特的跨文类创作做出新的阐释奠定了基础”。这些专论大致是从解构主义视角出发的,内容上互补,在“贝学”历史上首次清晰地展现了贝克特作为预言家的形象。

曹:按您的思路,也有一组“互文性”专论不可小觑,比如在《贝克特中的音乐与音乐中的贝克特》(2013)中,罗斯(Catherine Laws)就探讨了贝克特对欧洲古典音乐的吸收及其创作对欧洲当代音乐的影响;在《贝克特与影院》(2017)中,帕拉斯基瓦(Anthony Paraskeva)梳理了贝克特与影院交往的过程及影院对其舞台剧、荧屏剧创作的影响;而在《贝克特与视觉艺术》(2018)中,卡维尔(Conor Carville)则厘清了贝克特与(晚期)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视觉艺术的历史关系。如同《贝克特笔下的但丁:小说与批评中的互文性》(2005)那样,先前的此类专论多属同一文类,而这组专论是跨文类的,展示了新的动向。

欧:没错。那么第三组就是“政治性”专论,例如在《萨缪尔·贝克特与后殖民小说》(2009)中,比克斯比(Patrick Bixby)运用新历史主义方法分析了贝克特小说与爱尔兰历史、政治、后殖民思潮的隐秘联系,令人耳目一新;在《贝克特的政治想象》(2017)中,莫林(Emilie Morin)从社会历史学角度“阐释了贝克特的双语文本如何重新想象政治史”,其学识令人惊讶;而在《贝克特与余波政治学》(2018)中,马克诺顿(James McNaughton)则阐释了贝克特的创作如何对爱尔兰内战、欧洲的分化、法西斯的崛起和二战恶行等做出回应,再次展现了贝克特的政治意识。

曹:这组专论体现了全新的趋向:前者颠覆了贝克特“倾心无知、无能”因而“不涉历史”“无关政治”的传统观点,中者将对贝克特与政治史关系的研究从爱尔兰拓展到了欧陆,而后者则发掘了贝克特对战后欧洲政治意识的独特呈现。三部专论打开了从后殖民或政治学角度解读贝克特的大门,为新领域的开拓做出了“无价的贡献”。

欧:此言不假。另有两组专论略显传统,但不乏新意和深度。在“爱尔兰性”专论中,莫林(Emilie Morin)所著《贝克特与爱尔兰性问题》(2009)和肯尼迪(Seán Kennedy)主编《贝克特与爱尔兰》(2010)最具代表性。而在“艺术性”专论中,杜尔法德(Lance Duerfahrd)的《贫乏的创作:贝克特的流浪汉与危机剧场》(2013)和安德顿(Joseph Anderton)的《贝克特的造物:种族大屠杀之后的失败艺术》(2016),则与你的大作《贝克特“失败”小说研究》(2015)在思路上有些相似。

曹:这五组专论推陈出新,可以说代表了近10年欧美贝学在纸质作品研究领域的成果和动向。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欧:鉴于贝克特与先锋派戏剧及艺术的密切联系,欧美尚有许多导演、表演艺术家、电台和电视艺术家从事贝克特戏剧艺术、导演艺术、新媒体艺术的整理和研究,出版了很多具有独特史料价值的纸质版著作,也发行了不少相关影视作品和纪录片。要知道,贝克特曾在不同时期在法国、德国、英国等地的许多剧场指导排练自己的舞台剧、电台剧甚至电视剧;由于新技术的采用和新灵感的产生,即使剧本无一字改动,他的导演台本总会新增许多微妙的订正。不同时期、不同剧场的同类台本的解读与对比研读是一个弥久而新的研究领域;若是将世界各国自行排演贝克特戏剧的台本——比如爱尔兰阿比剧院和大门剧院完整保存的本院历年导演台本——以及主演的相关回忆录联系起来,那么这一方面会足以同对贝克特纸质作品的阐释比肩。

曹:以非纸质作品即戏剧艺术的研究为焦点,在中国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您能举例说明吗?

欧:以英美为例吧。拜恩奇尼(Natka Bianchini)所著《贝克特戏剧在美国》(2015)就对阿兰·施耐德(Allan Schneider)任美国版贝克特戏剧导演的遗产进行了条分缕析,而塔克(David Tucker)和马克提格(Trish McTighe)所著《在大不列颠排演贝克特戏剧》及姊妹篇《在爱尔兰和北爱尔兰排演贝克特戏剧》(2016)细致梳理各个时期贝克特戏剧在英、爱两国编排的过程、原则和特点。这类成果是贝克特戏剧接受史的活教材,值得细致分类和系统整理。不过,欧美艺术界十分尊重版权,因此这类台本及其研读尚未全部出版,更未联通上网。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一态势的持续发展是可以预见的。

曹:这一方面中国文艺界可以做出少许贡献,例如世纪之交北京、香港排演的三个半《等待戈多》,新世纪初台湾传奇剧场排演的京剧版《等待果陀》,近年北京多个剧场在爱尔兰导演简-斯盖夫(Sarah Jane-Scaife)的指导下排练的《所有跌倒的》和《来来往往》等短剧。据我观察,第三个方面估计是手稿、笔记、日记和档案的整理研究吧?

欧:是的。在20世纪末,英国、爱尔兰的专家就开始对贝克特创作笔记进行比照研究,解开了贝克特创作尤其是早期小说创作中的许多谜团。近年,经贝克特遗产理事会惠允,安特卫普大学手稿遗传学中心与雷丁大学贝克特国际基金会、得克萨斯大学兰瑟姆人文学科研究中心紧密合作,联系法国国家档案馆等10余家相关机构,完成了贝克特数字化手稿项目(BDMP),推出了有关小说三部曲、戏剧三部曲等作品的创作过程的系列著作(2015),建成了涵盖读书笔记、草稿、初稿、打印稿、校订稿等在内的贝克特手稿数据库,从而大大推进了原典和版本流变等专题研究。2018年12月,该项目成果的上线还获得了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颁发的文献、档案与数字化项目出版奖。

曹:这一方面应包括您刚完成的贝克特书信收藏信息线上项目(LROP)。该项目将美国境内26家文学档案馆所藏贝克特书信的信息联通上网,方便世界各地“贝学”中人直接查询。

欧:只是与欧洲众多收藏馆或所有者的版权谈判过于繁杂,我们对欧洲境内那14000多封书信相关信息的整理才刚刚开始,因此得过两年才能建成完整的贝克特书信线上图书馆。在回归原典这一方面,《贝克特的藏书》(2013)也具有典型性:该书分析了巴黎所存贝克特700卷藏书中的笔记、誊抄和旁注,探究了他将所读材料融入、译入、移入自己作品的方式,从而填补了对其创作过程研究的很大一部分空白。此外,《贝克特的德国日记:1936—1937》(2011)经整理,也列入“现代主义的历史语境”丛书出版了,这样“贝迷”们就可以直接进入贝克特漫游德国期间那纷繁的艺术世界和躁动的精神世界了。

曹:这类创作前的研究可与稍前对作品原稿、创作笔记等创作中的研究相互佐证,更可与第一、第二方面涉及的创作后和创作中研究构成完整的体系。看来,每一方面都很兴盛,也都还有很大空间。这正印证了您的没有贝克特之后一说的含义。那么,作为贝学资深学者,您认为在世纪之交以来产生的卷帙浩繁的

成果中,有哪些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呢?

欧:我倒愿意说具有工具性价值的。无论如何深奥或新颖,专论都以工具书为依托。况且贝克特的作品如此艰深、复杂,就许多话题、从许多角度都可做出精辟、创新的论述,而这样的成果往往难分伯仲。因此,轻易不要用具有“终结”或“俯视”意味的词来形容相关著述。

曹:我以为,您对话题的修订反映了中美学术界价值追求的些许差异。我们过于看重专论及其级别,而你们推崇的既有深度研究,也有工具性成果的开发。那么,就贝学研究而言,近年有哪些工具书是不可或缺的呢?

欧:如果不算厚此薄彼的话,主要有诺尔森(James Knowlson)撰写的《盛名之累:萨缪尔·贝克特传》(1996)、阿克利(C. J. Ackerley)和贡塔尔斯基(Stanley Gontarski)编著的《费伯版萨缪尔·贝克特指南》(2006)、洛拉(Seán Lawlor)和皮林(John Pilling)编著的《萨缪尔·贝克特诗集》(2012)以及菲森菲尔德(Martha Fehsenfeld)和我主编的《萨缪尔·贝克特书信集》(2009—2016)。

曹:据我个人的研读经历,《盛名之累》也是理当首选的。这部经贝克特授权撰写的传记将海量的信息融入线索连贯、引人入胜的叙事中,是一部学术严谨、记录翔实得令人敬畏的著作,纠正了有关贝克特生平和创作的许多误会、误解和误读,因而是贝学必读书目。那么,《费伯版指南》何以入选呢?

欧:该《指南》按词条首字母的顺序排列,是对贝克特作品、生平及思想最全面的导读,为所有研读贝克特作品的人提供了细致的参考。其中许多复杂的词条几乎就是专论写作提纲,例如“艺术”一项就把贝克特所有作品、日记和书信中的相关内容做了清晰的梳理和精炼的评述,“身体”一项把贝克特所读文献中的相关论述、作品中的有关变形做了系统整理和简要解说,而“算术”一项则把贝克特所有作品中的算术谜团及与非理性主义和符号学的关联作了厘清和必要的阐释。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基于精细考证、利于文本细读和论文撰写的导读全书。

曹:对贝克特小说中的谜团(比如“伶伦制律”的典故)不得其解时,我确实从《指南》中寻到了有益的观点和思路。假如《盛名之累》偏重对贝克特生平及其与创作的关系的历时梳理,那么《指南》则侧重对贝克特作品中的疑难之处进行分类耙梳,二者互补。至于《诗集》,其“工具性价值”何在呢?

欧:《诗集》不仅按时序收集了贝克特创作和翻译的所有诗歌(其中许多是未曾发表或从未重印过的),而且补充了各类注释(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二),以展现这些诗歌的各个侧面,如创作语境、修改过程、隐晦典故或引文的来龙去脉、在其他作品中的改写或回响等,使读者得以追溯嵌入贝克特想象力DNA中的那些模式。这也是一个学术型版本,凭此读者可以鸟瞰贝克特如何在自己的“词语工棚”里造出有意义的模式,并发掘其诗歌与小说及戏剧未曾有人探讨过的互文关系。

曹:由此可以推断您挑选《诗集》作为第三种工具书的依据了,那就是填补诗歌(非主要作品)整理和导读的空白。而《书信集》入选的依据,则必定是填补私人书信(非出版作品)整理和导读的空白。这算是知其所以然了吗?

欧:是的。贝克特生前见诸报刊的书信寥寥可数,而贝克特通信项目团队从散落于欧美各国的档案馆、图书馆、手稿室、研究中心和上百名收信人及后裔手中收集了已知信件16000多封,并选取与创作有关的全文约2500封,另摘录约5000封,才编成这四卷大部头。从那长达15页的致谢和授权名单,你就可以想见在长达30年的编撰过程中,填补空白的付出有多大。

曹: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其学术价值您能列举一下吗?

欧:首先,贝克特在创作中奉行极简主义,而且从不公开进行自我批评,因此只有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即

《书信集》的正文本中,我们才能发现作品背后的动因,揭开人物面具看到作者本真。

曹:没错,作品是反复打磨而成的——贝克特的《创作笔记》和同一作品的多部手稿之间的差异就是力证,而相关书信则是即席写就的,最真实地反映了贝克特当时的心态、动机和言语习性。

欧:就是说,读他的作品是进入虚构世界,读他的书信则是进入真实世界,二者需要联通。而且,贝克特与欧美众多先锋派作家、导演、艺术家和出版商都通信频繁,因此对于任何对20世纪西欧文学和戏剧饶有兴趣的人来说,这套集子都是基本读物。

曹:事实上,这些书信本身的价值已为中美学者共知了。2019年5月,贵国《现代文学杂志》主编瑞贝蒂(Jean-Michel Rabaté)在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刊发的《贝克特与精神分析》一文,就是通过回顾贝克特的书信来探讨精神分析与其创作的复杂关系。

欧:该文实现了两个世界的“联通”。第二,世界大多数文豪的书信集仅是书信本身按时序编排的集子,基本没有对书写特征、背景信息和具体内容的详细注释,甚至缺乏导读和序言,因而算不上学术型。相比之下,这套《书信集》的另一种学术价值就凸显了出来。作为卷一的汉译者,你应该了如指掌吧?

曹:是的。《书信集》的副文本是细致记录、严谨考证、精心整理、系统评述的结果;保留了书写特征,编入了信件状态,尤其对信件本身的内容进行了注解,而且收入了编辑体例、全集总论、各卷绪论、译者序等。可以说,这些齐备的副文本才是《书信集》作为学术型总集的价值所在,与正文本相得益彰。说到这里,我又很好奇,是怎样的编辑原则使得这些副文本的主体(即对信件的注释)与中国古文献学中的考据和注疏如此相似呢?

欧:是吗?这是作者意图与编辑原则协调的结果。在授权编写《书信集》时,贝克特就交代,仅涉创作,切勿评论。一方面,贝克特及相关通信人的隐私必须得到尊重——在他看来,盛名即是受累;另一方面,贝克特愈少即是愈多的意志不可改变——添加评论即是误导读者。但玛莎和我认为,须有语境才能解读,对此贝克特欣然接受。于是,我们确定的编辑原则就是极简主义原则:凡涉及创作的信件才得入选;凡对理解信件必不可少的才予以注释。因此,《书信集》就有正文本和副文本之分,而副文本则有注疏性(信件注释)和评论性(各类绪论)之别。

曹:所以其学术价值也得分两方面来说。在我看来,切勿评论的要求是《书信集》无限接近原典的保障,而须有语境的坚守则是读者不断走向原典的保障。这大概就是推动《书信集》成为工具性成果的动因吧。

欧:没错。换言之,这一动因就是回到原典的信念。我们编撰的不只是一套自身即为终结的书,而是可以据此写成许多专论的众论之书。

曹:在上述工具性成果中,《盛名之累》已由商务印书馆委托王雅华领衔汉译,而四卷《书信集》正分别由我、张和龙、张亚东、龚蓉主持汉译,不久就可以完成半个世纪以来贝克特汉译的大业了。

欧:十分期待!记得2019年5月9至11日,国际萨缪尔·贝克特学会以萨缪尔·贝克特与翻译为主题,在西班牙的阿尔梅里亚(Almeria)大学举办了第五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议题既包括贝克特个人及与他人合作进行的翻译活动,也覆盖贝克特作品的外译。这次会议有一个亮点,就是有中国译者参加了会议,使汉译首次成为贝克特外译中不可忽视的新议题。

曹:就个人而言,这似乎标志着中国学者在“贝学”领域不再是西方亦步亦趋的跟随者,而是创造了贝克特域外生命的平等对话者。

欧:言之有理。其汉译是欧洲以外的首次大规模译介。鉴于贝克特作品的繁杂与艰涩,汉译必定经历了漫长的努力。请问,这一成就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历程呢?

曹:这一成就要归功于湖南文艺出版社团结一批研究型译者,于2016年推出22卷本《贝克特全集》。该社从欧美各国出版方购买了贝克特所有原作的版权,因此该集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第一套《贝克特全集》。在贝克特进入中国图书市场的过程中,这其实是四大步中的第三步。

欧:哦,愿闻其详。

曹:第一步是1965年施咸荣汉译的《等待戈多》以黄皮本即内参的形式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刊行,使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和追求新知的文艺青年得以接触那部划时代的作品。但此后30年,即使诺贝尔奖效应逐步显现,也只有两部戏剧(《快乐的日子》《终局》)和三个短篇小说得到汉译,列入《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或《当代外国文学》等丛书。

欧:起步缓慢。

曹:这一生发期的译介有个更显著的特点,就是受冷战的影响,翻译的目的是让读者看看西方社会有多么荒诞,看看荒诞派戏剧是如何反映这一现实的。这一点在相关评论中得到了充分反映:莫不冠以荒诞、堕落之名,将存在主义哲学和先锋派戏剧意义上的荒诞挪移到政治学、社会学领域,从而为己方效力。

欧:这是东西方对峙时代的烙印吧,也可以叫作历史性误读,其背后是简单的模仿论和工具论。即便如此,相关译介30年止步不前,还是令人感到意外。如此算来,第二步应该是在世纪之交吧?

曹:更准确地说是在21世纪之初。余中先领衔的团队翻译了巴黎子夜出版社的集子,于2006年推出五卷本《贝克特选集》,为贝克特的中国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有趣的是,原作用法语写成,而这个项目也得到法国文化部支持,这两点让大多数中国读者以为久居巴黎的贝克特是法国作家。为此,在贝克特百年诞辰全球庆典期间,爱尔兰外交部门不得不出面,以贝克特一直持爱尔兰护照为由进行澄清。

欧:若贝克特久居伦敦,那他的民族归属就具有更大的去殖民价值。如你撰文所言,有关爱尔兰裔作家国别归属的争议,其背后是文化上的去殖民努力与殖民主义残余之间的较量。话归正题,这一兴起期的译介有何区别性特征呢?

曹:有两点。其一,余中先团队译出了贝克特近一半的作品,功莫大焉,但事先和事后均很少就相关译介发表评述,因而在学术界没有出现该有的回响,这一点事实上约束了译介活动产生的后续影响。其二,该《选集》沿用了原版切勿评论的风格,即译本中没有插入任何绪论、注释、前言或后记,因此本就不多的读者没有副文本可资借鉴,更难以就原作主题、写作特色、翻译过程等话题进行探讨。

欧:于是,在《贝克特在全球的接受》(2006)一书的第八章《在中国的接受》中,该《选集》就成了仅为百年诞辰生产且只供顾客消费的商品,而非可由读者欣赏和亲近的名著选集。

曹:忽视新的读者对象,沿用在原语语境中适用的编辑原则,其结果就是《选集》被冷冷地物化。由于解读和评述的匮乏,该《选集》在贝克特的中国接受史上本应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大打折扣了。

欧:但译者的遁形是作者至上的要求,况且贝克特走的就是与通俗读物背道而驰的路线。而你从这个《选集》的接受中似乎发现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必要性,是这样吗?

曹:不尽然,要区分间接介入和直接介入。前者指副文本并不归属、扰乱原作本身,但对于原作的接受大有裨益;后者指编辑或译者对原作的有形删改,是权宜之计。在前一情形中,原文本是忠实、完整的;在后一情形中,原文本是变形、缩减的。对于艰涩名著的译介,间接介入是绝对必要的,而直接介入则要慎之又慎。

语境转换了,传播策略亦应调整。名著的域外生命不是域内生命的复制,其创造需要译者的现身,需要副文本的共存。译者是最细致的读者,没有译者主体性的助力,艰深的翻译文学就只有束之高阁。作者已

死,原出版商亦死,就是说不能刻板地要求域外的出版商亦步亦趋。况且阅读史就是误读史,原作者和出版商没必要为更多的误读担心。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丰富的误读正是名著经由多棱镜折射出的绚烂光芒。

而对于直接介入,《选集》的出版商和译者是在目的论意义上忠诚地避免了的。原作的中心地位没有动摇;原作和读者相向而行是在《全集》中才实现的。

欧:事实上,为了保持作品原有的丰富含义,即新批评意义上的含混性,贝克特才要求编辑和出版商切勿评论。我依然好奇,假如《全集》代表了相关译介的鼎盛期,那么作者至上的兴起期是如何向兼顾读者的鼎盛期过渡的呢?

曹:这一过渡确实少为人知。发现贝克特大多数英文原作尚未汉译时,我便向湖南文艺出版社毛遂自荐,并申请了“爱尔兰文学交流”(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项目,译出了《莫菲》和《瓦特》,使其于2012年推出11卷本的新《贝克特选集》。这是贝克特中国译介史从法汉翻译向英汉翻译转折的标志,扭转了半个世纪以来贝克特英文原作仅有极少数文字浅显的篇目得到汉译的局面。

欧:你是生逢其时呢!看来这一转折的背后有三个动因:译者的学术意识、出版商的市场意识和赞助人对作家民族归属的政治意识(即对本国文学作为对外名片的传播意识)。三者合力,易成盛事。估计就是这次转折为《全集》铺平了道路吧?

曹:是的。随后我向出版商提议在贝克特110周年诞辰之际推出《全集》。出于独此一家的愿景,已在路上的出版商即刻申请“‘十二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项目。但尚待翻译的作品多是贝克特青年时代模仿乔伊斯和其他先锋派作家的习作,文字艰涩,典故繁复,因此翻译过程异常艰难。其中最“烧脑”的是朱雪峰首译的《梦中佳人至庸女》——贝克特模仿《尤利西斯》的长篇处女作,其次是陈俊松重译的《论普鲁斯特》和我首译的《但丁·布鲁诺·维柯·乔伊斯》^①等两篇专论。

欧:可以想见。西方权威的贝克特学者都曾怀疑这样的作品和专论能否翻译。鉴于其重大意义,汉译《全集》已为埃默里大学罗斯图书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当代文学图书馆等机构收藏。相对于先前的兴起期,这一迅疾到来的鼎盛期的译介有何特点呢?

曹:除了有英汉、法汉两支译者队伍的参与外,主要是《全集》收纳了富含价值的副文本。这些副文本主要有两类:一是原书编辑和权威学者就手稿校订或创作过程所写的《前言》和《出版说明》;二是英汉译者针对原作层出不穷的疑难之处(如典故、文字游戏、英语或法语之外的语言)所做的脚注以及法汉译者为再版增补的脚注。作为原书编辑和译本编辑均在场的痕迹,这些副文本是《全集》与《选集》在形式上的最大差异所在,同时也是译者间接介入的标志。

欧:进步显著。但也看得出,《全集》形式上的欠缺是没有总序和各卷译序或后记。这一点似乎表明,除了出版商的组织和编校工作外,在这一宏大的翻译工程背后并无统一的学术协调。因此,若非你在报刊和网络发表的《寻找容纳混乱的形式》等评述,《全集》的缘起、翻译过程和翻译策略等就仍不为读者所知了。现在,第四步已经呼之欲出了,就是出版过程中的汉译《书信集》吧?

曹:没错。《全集》推出后,出版商便向我咨询,并申报了“‘十三五’国家重点规划图书”项目,从而为《书信集》的翻译、出版铺平了道路。事实上,早在2011年我在贝克特的母校访学期间,“爱尔兰文学交流”的负责人就向我推荐了《书信集》已出版的两卷。

欧:在这一宏大的翻译、出版工程的背后,我再次发现了那三个动因。作为先期译者,相信你在翻译和

① 原文为“Dante...Bruno. Vico...”,点的数量表示间隔时间的长短,点表示世纪的数量。

修订过程中都发挥了标杆作用。以卷一为例,你是否延续了学术型且兼顾读者的标准呢?

曹:当然。最显著的标记是就典故、错别字、行文特征、文字游戏、非英语片段、文化或历史背景等增补了259处脚注。对于已有出版译文的片段,例如收入《碎片集》的书信段落和收入《诗集》的早期诗歌初稿,也置于《书信集》界定的历史语境中重新翻译,并就显著的差异加注说明,最大限度回归原典。

欧:但与出版作品截然不同的是,这些书信均是即席写就,行文跌宕,有时措辞生僻,且错字连篇。请问这类句法、词法上的特征,能用汉语传达得神似吗?

曹:能。汉语作为意合语言的优势能得到充分发挥,使用流水句、无主句、把字句、破句、同音词或同形词等,能贴切地传递贝克特写信时的心态和思绪,并生动地再现其书信本来的面貌,及其与经专家修订的先前出版版本的细微差异。甚至对于人称代词,换用汉语中发达的称呼语更能传神地表现贝克特与收信人的亲疏关系。

欧:你的行文应当非常灵活。另外,贝克特的英语书信中插入了许多非英语片段。他这么做是有特定意图的,对此你是如何处理的呢?

曹:与《全集》不同的是,《书信集》汉译时非英语片段均得到保留,一则行文不与信后的注释重叠,二则借此创造一种中、西文夹杂的“夹生饭”文体,既最真实地反映贝克特的行文特征,也与同时代中国留洋作家(如郭沫若、鲁迅等)的文体切近,折射其文化背景的多元性。

欧:看来,对于小说作为出版作品和书信作为非出版作品,你有着清醒的认识。最后一问,可否说你特别适合从事学术型文学翻译?

曹:大抵如此。正如贝克特决计与乔伊斯背道而驰,我走的是与贵国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进行直接介入相反的道路。对于学术型著作,译者必须持间接介入的立场,而对于非学术型文学,则可采取直接介入的手段。有经验的译者会感知到文本类型学和历时译介学的指导意义。谢谢您拨冗对话!

欧:也谢谢你对贝克特在中国的接受及汉译历程发表评述,为欧美同行打开一扇窗户!

Recent Trends of S. Beckett Studies: A Talk with Lois Overbeck

CAO Bo

Abstract: This talk took place between Prof. Cao Bo and the famous S. Beckett scholar Lois Overbeck while the former furthered his studies at Emory University. After touching upon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recent Beckett studies, they elaborated the three trends in the West: more innovative researches made on Beckett's published works from various points of view; more sorting studies of Beckett's theater art demonstrated in his directions and innovations and others' directions and performances; more going online of studies of Beckett's manuscripts, diaries and archives that lead readers "back to the cannon." As to research tools, Overbeck recommends four that complement each other: *Damned to Fame*, *The Grove Companion*, and *The Collected Poems* and *The Letters*.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section, Cao expanded on the features of the four stages, with his focus on the value of those "paratexts" in the history of relevant scholarship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indirect intrus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scholarly texts. This talk is inspiring to the Chinese Beckett circle and makes known to the West the featur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Key words: Samuel Beckett; trend of scholarship; primary reference book; Chinese translation; paratext

责任编辑:陈宁